

二战后非洲华人社会生活的嬗变*

李安山

内容提要 二战后至今，在漫长的融合过程中，非洲华侨华人在生存、发展、适应方面有得有失，其社会生活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非洲各国的唐人街、中餐馆和中国的传统节日、婚姻仪式等文化载体，以及在非华人的处事方式等社会行为的发展变化，无不体现了他们社会生活的嬗变。华人在适应当地社会习俗的同时，尽量保留着中华文化的特质，并不断吸收所属国文化的因素。华人文化的保留、适应、吸收与演变不仅受到多种物质和人文因素的影响，还须加上“时间差”和“距离比”两个因素。

关键词 非洲华侨华人 社会习俗 唐人街 中餐馆 传统节日

作者简介 李安山，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北京100871)。

海外华人的移民定居过程往往要经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从早期的求生存以逐渐适应当地社会，再从谋发展到寻求改变自己，最后融入当地社会。在我看来，“对移民而言，民族认同可以是一个积极的过程，也可以是一个消极的过程；可以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也可以是一个被动的过程。然而，在面临只有一种选择的时候，这决不会是一个轻松的过程。”^①在这一漫长的移民认同过程中，作为社会中的人，华侨华人在生存、发展、适应和融合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也有所失。本文主要探讨二战后至今非洲

*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非关系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料整理与研究”(16ZDA142)的阶段性成果。

① 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第503页。

华人的社会生活。由于社会生活内涵极广，本文选取了唐人街和中餐馆以及华人社会的一些习俗为例，力图说明：非洲华人的社会生活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他们在适应当地社会习俗的同时，其生活中仍然尽量保留着中华文化的因素。

唐人街的历史变迁

在华人移民史上，唐人街总是被看作中华文化的聚集点，它也成为华人在海外的历史记忆。^① 我们说，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确实如此。然而，并非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唐人街。实际上，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与大批华人移民海外的时间基本重合，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与唐人街的建立有直接关系。英国人习惯于间接统治方式，其所在殖民地的华人相对比较容易建立唐人街。法国的直接统治与强制同化政策迫使华人改名改姓，更不用说建立保持自身文化特点的社区了。世界各国的唐人街可以说是海外华人艰苦拓荒和辉煌业绩的真实写照。

（一）毛里求斯唐人街

这是由以陆才新（Hahyme Choisanne）为侨领的福建人最早建立的。他的商店位于路易港马拉巴尔区和皇家大道（Royal Road）3号。他被总督指派到中国招募华人。^② 第二波华人来自于广东南海和顺德地区，他们的到来使原来的华人区从皇家大道（Royal Road）扩展到孙中山街（Arsenal Street）和大卫街（David Street）。19世纪60年代以后抵达的客家人主要集中在孙中山街沿线和皇家大道的南部。路易港的商业源于唐人街，制造业源于唐人街。根据官方数据，唐人街总面积135 750平方米，约合32英亩。^③ “路易港唐人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局限于华人的封闭区域。在中国商户、餐馆、寺庙

① 有关唐人街的经典著作可参见周敏：《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鲍霁斌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② Huguette Ly - Tio - Fane Pineo, *Chinese Diaspora in Western Indian Ocean*, Editions de l' Océan Indien - Chinese Catholic Mission, 1985, pp. 331 - 333.

③ [法国] 帕斯卡尔·萧（Pascale Siew）：《唐人街：毛岛往事》，路易港：威扎威出版社（Port Louis: Edition Vizavi），2016年版，第46~59页。本人感谢李立大使和韩康敏参赞在本人访问毛里求斯期间提供方便，组织各种活动，特别是送给本人这部著作。有关活动，详见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zwbdt_674895/t1415960.shtml，2017-05-14。

旁边，还有众多其他族裔、宗教信仰的人经营居住。毛岛最大的朱玛清真寺（Jumma）就坐落在皇家大道，紧邻唐人街。除个别寺庙外，唐人街中式建筑并不多，只有中国面孔、中国商品和随处可见的中文招牌告诉你，这里是唐人街。”^① 值得提及的是，毛里求斯市政厅为了纪念侨界先贤古文彬先生，决定将“花花巷街”（古先生住所所在街道）改为“文彬街”。古先生与吴韵琴、黎达夫于1912年创办新华学校，协力创办华商总会，创建中华医院，“对于华侨公益事业，无不鼎力提倡”。此举不但可使前贤伟绩永垂不朽，给华侨也增光不少。^②

毛里求斯的唐人街是路易港市最繁华的街区之一，也是集商业、文化、娱乐和住宅于一体的区域。首先，它是华人的商业中心，是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等地的各种商品的汇集地，这里的货物售价全市最便宜。其次，这里也是中国文化保留地，除寺庙外，还有华人学校（如新华学校）、华人社团（如南顺会馆和仁和会馆）等机构。第一个篮球场始建于此。唐人街还有诸多的中餐馆、中药店和中文书店，各种店铺都有中文广告和中文报刊。再次，唐人街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各种娱乐设施应有尽有，中国传统的各种节日（如春节、元宵和中秋）庆典都在此举行，有人舞龙、舞狮并分发糖果。各种有关中国文化的展览也在这里举办。各种音乐、美味和娱乐活动同时进行。最后，这里也是华人的聚居中心，唐人街上往往是车水马龙，进行各种游戏的孩子们在打闹，老年人悠闲自得地打发时光。

一位华人是这样回忆他在唐人街住所里的童年时光：“我的祖父母有18个孩子，部分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居住在约瑟夫·利威尔街（Joseph Riviere Street）上一座两层楼高的殖民式大洋房里……洋房隔壁住着一位印度裔老理发师，他会在一个铁皮小屋里给我剪头发。70年代时他退休后，铁皮小屋被改为街角小店。我常常去那里买‘Bellboy’牌口香糖和大白兔奶糖。由于商店实在太小，一次只能容纳4个顾客，所以店外总是有人排队。洋房对面是一所颇受欢迎的结婚礼堂。每个月都能听到那里的鞭炮声。这里还有一个篮球场，甲级联赛就在这里举办。那时候，联赛冠军可是被毛里求斯华人给垄断了……到了周末，三姑四舅们就开始打麻将，奶奶则喜欢和朋友们打中国

^① [法国] 帕斯卡尔·萧：前引书，第54页。

^② 古文彬先生哲嗣少彬、景祥、呈祥等借市厅会客室设鸡尾酒会招待中西贵客，以资庆祝。参见《市厅纪念侨界先贤 将花花巷街改文彬街》，载 [毛里求斯]《中国时报》1954年4月27日。

纸牌游戏。”^①

遗憾的是，1993年10月8日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唐人街30多栋楼房和商店，经济损失高达一亿卢比（约合567万美元）。更可惜的是，华商总会一直保存的华人来毛里求斯的珍贵记录文件全部焚毁，这给历史悠久的华人社区带来的损失不可估量。所幸的是，毛里求斯华人发扬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废墟上又建立起一条新的唐人街。目前，由路易港友好城市广东佛山市捐赠的两个牌楼分别矗立在唐人街的南北入口。每年，唐人街的各种节日吸引着各国游客。^②

（二）南非的唐人街

南非的唐人街经历了从马来营（Malay Camp）到专员区（Commissioner St.）再到西罗町（Cyrildene）的演变过程。华人早期抵达时的聚居点依不同地区而定。例如，约翰内斯堡的华人集中在西区，金伯利的华人住在马来营，伊丽莎白港的华人多住在马来基姆（Malaikim，似为“Malay Camp”的变音）。^③后来，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使介乎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华人无所适从，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择地而居。一些广东华侨在约翰内斯堡西区的专员街西端定居，形成了南非的“老唐人街”。在这条不到200米的街道上，店铺最多时达到30家。^④从1900年开始形成的老唐人街见证了南非整整一个世纪的政治转变及社会发展。由于治安问题，唐人街的生意后来比较萧条。从20世纪70年代起，由于南非与“台湾当局”关系拉近，加上南非政府的特殊政策，大批台商投资南非，因而形成了“半条唐人街”，有人认为这是新老唐人街的一个过渡点。^⑤

当代意义上的唐人街是新南非建立之后的事。大量台商的涌入使在西罗町大街出现了一些台湾商店，像“秦记面馆”、“大众快餐”、“台北人超市”

① [法国]帕斯卡尔·萧：前引书，第104页。

② “Reminiscences of the Chinatown of Port Louis”，*China Town Magazine*，December，2015，pp. 10 - 15.《唐人街杂志》为英文和中文双语，由华人舍琳·李（Shirleen Li）于2015年12月创立。

③ 有关早期华人在南非的情况，See Melanie Yap，and Dianne Leong Man，*Colour，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6，pp. 5 - 24.

④ 王昭：《非洲第一条唐人街》，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11月13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09-11/13/content_381968.htm，2017年5月14日。这种说法不妥，实际上，毛里求斯的唐人街形成更早。

⑤ 轩乾：《南非新老唐人街记录华人变迁（图文）》，载华侨新闻报/南非华人网：<http://www.nanfei8.com/huarenzixun/2014-12-15/13310.html>，2017-05-14。

等。随着大陆移民的增多，陆续出现了“上海熟食”、“北方水饺”等餐馆，华人超市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像“日记超市”、“欣欣超市”等。很多华人都在西罗町购屋置产。随着约翰内斯堡东区华人的增多，商机也逐渐显现。种族隔离制度在华人心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们对自己深受其害的种族区域法恨之入骨。1990年5月，中华总公会声明：华人长期反对歧视性的种族隔离居住政策，无法容忍任何将华人集中在一起的“唐人街”建设计划。^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长期为白人划定的居住区欢迎这一计划，希望通过华人来振兴所在城镇不景气的经济。^②西罗町和附近的华人商家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地产和租金价格也迅速上涨。2004年，百家商城的一个店铺价格为40万（约合61 920美元）~50万兰特（约合77 399美元），到2011年已经涨到400万（约合550 964美元）~500万兰特（约合688 705美元），6年时间店铺价格涨了约10倍。^③

2005年底，西罗町被正式注册成为唐人街。随着唐人街的正式注册和管委会的成立，各自为政的华人商铺开始联合，一方面解决经营上的诸多问题，包括营业地点、无序竞争、货源市场等；另一方面关注他们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在新移民的自发组织和中国驻南非使领馆的帮助下，后来又成立了南非警民合作中心，以保障华人的安全。西罗町唐人街管委会蔡庆会长透露，唐人街管委会成立三年，西罗町所登记在册的商家有73户，店主来源遍及两岸三地。截至2010年，华人商铺已达140余家。^④唐人街经营的品种也从单一餐馆和超市等商业店铺扩展到旅行社、糕饼店、肉店、美容美发店、通讯器材店、中药房、网吧和娱乐中心等。^⑤

① “Chinese Opposed to ‘Exclusive’ Areas”, *The Citizen*, May 25 1990; “Chinese Reject Group Areas”, *The Star*, May 25, 1990, Quoted from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p. 423.

② 有关南非华人社会就建立唐人街进行的讨论，还可参见：Karen Harris, “Closeted Culture: The South African Chinese”, ISSC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Ethnic Chinese,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Manila, November 26-28, 1998.

③ 陈肖英：《南非中国新移民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探析》，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32页。

④ 《南非西罗町唐人街书写华商创业历程》，<http://www.gkstk.com/article/wk-7850000874163.html>, 2017-05-14.

⑤ 《南非约堡唐人街的去、现在与未来》，<http://www.9tour.cn/info/3040/349700.shtml>, 2017-05-14；《约翰内斯堡“唐人街”的由来》，载非洲时报/南非网：<http://www.nanfei8.com/haurenzixun/haurenzixun/2016-10-29/37569.html>, 2017-05-14.

(三) 亚的斯亚贝巴、拉各斯和塔那那利佛的唐人街

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商品的大量输入,一些非洲国家的新唐人街逐渐兴起。例如,亚的斯亚贝巴的唐人街竟然是以前的日本街(Bole Japan)。这里临近日本大使馆,原来居住着很多日本人,并因此而得名。随着近几年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关系的升温,这里便成了唐人街。“约100米长的街道鳞次栉比地挂着中文招牌,商店里摆满了中国产的蔬菜和调味料。据说,虽然主要顾客是在当地工作的中国人及其家属,不过由于商品种类丰富,也逐渐吸引了埃塞俄比亚当地人前来光顾。”^①有的国家或城市将中国商人比较集中的地方称为“中国城”,如肯尼亚的内罗毕。

调研中非关系的德国记者泽林在拉各斯发现,这里有尼日利亚最大的唐人街,有各种廉价商品,如衣服、电器、日用塑料制品等。^②马达加斯加的华人有100多年历史,但以前没有唐人街。20世纪90年代新移民的出现使中国商铺在塔那那利佛中心区聚集,独立大街附近出现了唐人街。华商在新华商场、东吴商场、天球商场等商铺出售各种商品。马达加斯加商人表示:“我们一般会来这里批发货物,然后到(马达加斯加)各省去销售。中国货物质量好,而且价格合理。我们每周都从这里进货,我们的顾客都非常喜欢这里的货物。”^③这个由中国商人和马达加斯加顾客组成的唐人街有20多家商场。其中一家商场像一个迷宫,由一个个盒子似的店铺组成,出售各类中国商品——服装、鞋、化妆品、手机和各类电子装置。^④

唐人街在很多国家成为最开放的文化融合之处。这里不仅聚集着各个民族的不同文化,也是品尝各种烹饪美食的理想场所,还是价廉物美的商品汇集之地,因而吸引了各民族人民来此购物和休闲。在酒吧、商店和娱乐场所,通过日常的社交活动,各种文化开始交流和融合。

① 《外媒: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存在感增强 日本街变唐人街》,载参考消息网:<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60922/1312892.shtml>,2017-05-14。

② [德国] 弗朗克·泽林:《中国冲击世界:看中国如何改变世界》,强朝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8~179页。

③ 《马达加斯加唐人街中国商品受欢迎》,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2-04/26/c_123039959.htm,2017-05-14。

④ 《南华早报:中国人涌入马达加斯加改变当地面貌》,载参考消息网:<http://world.cankaoxiaoxi.com/2013/0902/265105.shtml>,2017-05-14。

承载中国饮食文化的中餐馆

有唐人街的国家必有中餐馆，但并非有中餐馆的国家必有唐人街。我仍然记得在加拿大读博士时的一件事。1992年，我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决定到加纳做实地调研。我住在我的师弟、加纳大学历史系老师纳纳·布鲁库姆（Nana Brukum）家里，他的妻子和女儿将我当作自己的亲人，从而使我有了家的感觉和一种与其他学者不同的经历。为了答谢他们，我决定在回加拿大前请他们吃饭。当我请他们提出在哪里请客时，他们一致推荐一家中餐馆。这样，我们一起在那家中餐馆享受了一顿美味。中餐馆可以说是华人永远的骄傲。

（一）毛里求斯的广东菜与客家菜

毛里求斯的路易港汇集了各种餐馆。这里有不少颇具名气的中餐馆，如蓝天饭店（Ciel Bleu）、联合国酒店（ONU Hotel），后改名为新唐人街美食（New Chinatown Delis），以螃蟹汤出名的格罗斯餐厅（Gros Piti）、妈妈饭店（Mama Restaurant）、中央饭店（Central Restaurant）、白雪饭店（Snow White）。当然，这里还有毛里求斯最古老、从1948年开始长盛不衰的中餐馆——金龙饭店（Restaurant Lai Min）。^① 为了与时俱进，这家具有秘制佳肴的饭馆近年又从中国请来两位大厨，烹制适合中国人口味的各种菜肴，赢得了顾客的口碑。这里的“富阳虾”（Shrimp Fooyang）是其秘制菜肴之一。此外，咕嚕肉在毛里求斯中餐馆最受欢迎。当然，如果你不吃猪肉，可以用鸡肉或鱼肉来代替。^② 广东菜可谓制作精美、口感丰富。

客家菜自然质朴、营养实惠。客家菜重油多盐，选用的多为自然经济的食材，如各种野生的植物叶、茎和根（如芋头、薯类）以及牲畜的各个部位及内脏。中国的著名客家菜品之一是用鲤鱼做成的鱼丸，在毛里求斯的客家人的鱼丸则用鸚鵡鱼替代。客家菜的特色佳肴包括酿豆腐、炒牛肚、盐焗鸡、

^① 我和夫人于2016年11月访问毛里求斯时，前毛里求斯文化部长曾繁兴先生（Joseph Tsang Mang Kin）及夫人邀请我们在金龙餐馆与仁和会馆会长及当地侨领共进晚餐，本人在此向曾先生夫妇表示由衷的感谢。

^② “Cuisine: The Oldest Restaurant of Mauritius is Found in Chinatown”, *China Town Magazine*, December 2015, pp. 29–32; “Cuisine: Sweet and Sour Pork”, *China Town Magazine*, July, 2016, pp. 32–35; [法国] 帕斯卡尔·萧：前引书，第118~124页。

梅菜扣肉、客家鲫鱼、猪肚包鸡等。此外，中餐馆还有各种价廉美味的佳肴，如煲仔饭、炒面、盖饭、炒饭、包子、饺子、烧卖、及第粥、云吞面、鱼生粥、鸡球粥、鱼翅汤、牛肉丸、牛筋丸、鲩丸、煎芋丸、蒸萝卜丸、白糖糕、凉粉、烧鸭、叉烧、年糕和姜糖等。可以说，这里至今仍是品尝地道的粤菜和客家菜的美食圣地。^① 2004年，华商总会发起创立中国美食文化节，每年5月在唐人街举行。2016年的第12届美食文化节请来少林寺武术高手，中国厨师协会从天津派来3名厨师，留尼汪的舞蹈艺人也前来献艺。唐人街美食文化节已成为毛里求斯最受欢迎的喜庆活动之一。“唐人街周围大街小巷鲜艳夺目的宫灯和彩旗高挂，处处呈现着欢乐的景象。各类美食商贩们在唐人街两旁和多个停车场的帐篷里，仁和礼堂等献艺营业。闻讯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各族民众和游客络绎不绝，人们以目睹盛况为快！唐人街暨周围一带，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之中，热闹非凡。”^② 这一盛会吸引当地民众和外国游客近距离体会中国饮食文化。

（二）南非老船长的北京楼

南非据称有200多家中餐馆，分布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最多还是在约翰内斯堡市，大约有130家。^③ 中餐馆服务不仅面向中国人，当地民众中不少人也非常喜欢中餐。一些人认为西罗町最具代表性的东西就是这里的中餐馆，^④ “拥有约翰内斯堡最好的中国美食”。^⑤ 中餐馆各种食品和配料多从中国内地、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口。由于服务对象逐渐从华人发展到了当地居民，每到周末餐厅生意火爆，中外顾客同享中华美食成为西罗町的一大亮点。在唐人街的中餐馆，食客可以品尝到中国的各种菜系。南非上海商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备文先生因在海上行船30余年，被称为“老船长”，退休后长期定居南非。他的女儿在约翰内斯堡开办了一家北京楼饭店，占地面积700平方米，餐具和设施多从上海进口，从规模、装潢和服务上在华人开办的餐馆里堪称一流。厨师来自上海。北京楼的员工大部分是黑人，这里成为中非文化交流

① 刘新舜：《他山之石》，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② “Chinatown Food & Cultural Festival 2016”，*China Town Magazine*，July 2016，p. 39.

③ 《中国移民在南非的衣食住行》，<http://www.globevisa.com.cn/news/42694.html>，2017-05-14。

④ 《南非约堡唐人街的未来》，2008年4月30日，<http://www.9tour.cn/info/3040/349700.shtml>，2017-05-14。

⑤ 《约翰内斯堡“唐人街”的由来》，载非洲日报/南非华人网：<http://www.nanfei8.com/huarenzixun/huarenzixun/2016-10-29/37569.html>，2017-05-14。

的平台，中国厨师教当地黑人员工烧中国菜，如扬州炒饭、咕嚕肉和蒸鱼等。^①

（三）西迪中餐馆

一些非洲人也开始经营中餐馆。南非妇女西迪·陶经营的中餐馆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部的索韦托。她于2004年在广西柳州的私立学校当过英语教师，在那里对中国菜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中国朋友的指导下，她学会了多种菜肴的烹饪方式。西迪说：“中餐吸引我的原因是它的营养丰富，烹调时间短，且大量选用新鲜原料。”她的餐馆是索韦托第一家和唯一的中餐馆，自2007年7月开业以来，吸引无数食客前来品尝东方菜肴。她说：“大家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里的中国菜都是黑人烹制的，更不相信餐馆完全由黑人经营。”目前，她的餐馆主要供应炒面、炒饭、炒茄子和蘑菇炒鸡等，其中最受欢迎的还是炒面。她还准备了一些中式饮料，如冰绿茶、冰红茶等。为进一步丰富中餐知识、提高烹饪水平，她自费拜一位中国大厨为师。她有一次在西罗町一家中餐馆点了一份海鲜炒面，面里只有一点海鲜，很多豆腐。她对老板说，“不要蒙我，我会做中餐。”老板只好给她换了份名副其实的海鲜炒面。2007年，西迪在当地举行的年度女企业家评选中获奖。^②

目前，中餐馆在非洲遍地开花。可以说，开餐馆是中国人最早移民海外的谋生手段之一，“三把刀”之一即菜刀。非洲的中国新移民虽大部分经商，开中餐馆的也不少。以肯尼亚为例，中餐馆在1992年只有4、5家，到2002年已有40家。2008年底，仅在内罗毕就有50家中餐厅。非洲较有名气的中餐馆多占有区位优势，除了环境优美外，绿化、服务和卫生是基本条件，如加纳阿克拉的“王朝”处于繁华区，多哥洛美的“中国城”在海边，肯尼亚内罗毕的“天天”（Tin Tin）位于肯雅塔国际会议中心底层、“中国园”在联合国机构和美国大使馆附近，乌干达坎帕拉的“方方”开在市中心商业区的大楼里、“南京”开在富人区。^③近年来，中国和埃塞俄比亚两国关系升温，中餐馆数量随之增多，如中式装修、价位较高的“王朝大酒店”（Han

^① 钱丽君：《老船长》，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总会：《追梦——上海人在非洲》，自印本，第51~52页。

^② 袁晔：《南非黑人经营中餐馆备受欢迎》，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7-05/29/content_6165774.htm，2017-05-14。

^③ 2000年，本人随中国教育部代表团访问东南部非洲的四国（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赞比亚、乌干达）时就对当地华人餐馆有所体验。当时，我们曾在乌干达的方方餐馆就餐。

Restaurant)。该酒店有中国女孩做服务员，火锅桌调料齐全。愿意品尝正宗川菜的食客可去“蜀国布衣”（China Food），希望吃大盘鸡的可去新疆餐馆“抓范儿”（Zhua Fun）。津巴布韦哈拉雷的中餐馆生意兴隆。“竹园酒家”由祖籍顺德的谭先生经营。他继承父辈家业，开设了这家餐馆，由他的儿子和3位当地黑人担任厨师，另外还雇用了5位白人女招待和5位黑人男招待，菜肴是广东风味。华人还曾在这家酒店招待过到访津巴布韦的中国政府总理。^①

2005年，“北京饭店”老板毕建亚到加蓬考察投资环境，发现加蓬人对中国人十分友好，首都利伯维尔中餐馆不多且一般规模不大，当地餐馆午餐因价位太高（约1万非洲法郎，合19美元），几乎无人光临。他由此看到了商机。2006年5月，占地约1300平方米的“北京饭店”在利伯维尔上班族集中的区域开张。中餐馆为上班族推出了价位在5000非洲法郎（约合9.6美元）的小型自助餐，冷盘热菜不少于30种。由于饭菜可口，价格适中，北京饭店的自助餐大受欢迎，每天总有160多人就餐。饭店生意日益红火，并受到当地媒体关注。加蓬《团结报》评价：“自北京饭店数月前开张以来，每日都顾客盈门。所有跨进饭店门槛的人都好像一下子置身于中国，感到一阵惊喜。在这里，人们不仅对东方式的装潢稀奇，而且对中国那别具风味的美食赞不绝口。”饭店服务员从中国国内招聘，身着有喜庆色彩的红色中式对襟衫，面带微笑，训练有素，给前来就餐的人宾至如归的感觉。毕建亚认为：“我们的餐厅所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美食，还有中国的文化。我们就是要通过北京饭店这个橱窗，让加蓬人和世界各国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②

中餐馆为华人和当地民众带来了中国佳肴，更重要的是让非洲民众有机会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非洲的中餐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餐馆的整体形象有待改善。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是卫生状况，特别是洗手间的卫生。其次是餐厅的服务质量。2015年3月，内罗毕一家中餐馆出于安全考虑，拒绝让黑人傍晚五点后就餐，肯尼亚发行量最大的报刊《民族报》连续多日大篇幅对此事进行报道，称餐馆此举是搞种族歧视。再次是一些中餐馆（如在西非一些国家）将色情纳入服务范围。有的餐馆配备

① 黄炯湘：《津巴布韦的华人》，载《编译参考》1984年第5期，第65页。

② 任亚秋：《加蓬“北京饭店”老板创业记》，载[美国]《侨报》2007年6月18日。

“卡拉 OK”，成为业余活动的场所。这些地方鱼龙混杂，色情活动也随之存在，极大地损害了中餐馆在非洲的形象。^①

华人社会习俗的变与不变

（一）传统节日

传统节日是维系海外华人社区的纽带。华人的欢愉之情在节日里充分表现出来。春节对非洲华人意义重大，新的一年必须开个好头。人们在农历腊月十六以后就开始准备除旧迎新。家庭打扫卫生，企业还清债务，迎接好运。毛里求斯华人保留着春节歇业的传统，在家团聚。除夕当晚，一家人享受着丰盛的晚餐，品尝各种稀有的山珍海味如海参、鱼翅、鲍鱼、牡蛎、干扇贝等。大年初一，有些家庭吃素，成家的孩子到父母住地看望。初二，各家放鞭炮感谢神明，驱走恶鬼。鞭炮渣不能立即清扫，否则会将一年的福气扫走。随后，晚辈给长辈拜年，长辈给晚辈发红包。“人们忙完家中仪式后，就到关帝庙祭拜，在那里又是一场鞭炮声和狮舞登场的热闹场面。到处弥漫着深厚的熏香。祭坛上摆放着祭品，包括程式水果、糕点、猪肉、鸡肉、鱼、酒、茶等。”^② 毛里求斯一度是除亚洲一些国家之外唯一将春节作为法定假日的国家。元宵节将春节的欢庆带入尾声。晚上，唐人街再次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全家在一起吃元宵，还有各种灯笼彩灯以及舞龙舞狮。对于华人热衷于春节欢庆之事，国外公司也十分在意。1962年春节前，毛里求斯英美烟草公司在《国民日报》登出广告，该公司全体同仁“谨向华人团体、商人、全体华侨友人，以最热烈之心恭贺贵国元旦”。^③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端阳），也称龙舟节，这也是海外华人重视的中国传统节日。以前，毛里求斯华人庆祝端午节时，往往在路易港大剧院举行公演，剧目有“双喜临门”、“闹公堂”、“宝贝夫妻”、“打渔杀家”、“桃花摆渡”等，节目多由华人自己编排。这种庆典凝聚了华人社区，也给大家带

^① 由于去非洲的中国女性很少，一些中国年青女性专门为男性从事性服务。参见常江、袁卿：《再见巴别塔——当中国遇上非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8~69、98页。

^② [法国]帕斯卡尔·萧：前引书，第154~157页。华人将春节作为传统节日，作者视春节庆典为宗教。

^③ 《模里西斯英美烟草公司全体同人鞠躬》，载[毛里求斯]《国民日报》1962年2月3日。

来欢乐。1957年,“桃花摆渡”刚从闽南高甲戏中发掘出来即由华人朱维导改编为京剧公演。端午节后《新商报》上专门发表了两位演员的来稿,曾酸梅子的《我饰演桃花姑娘》和梅笑仙的《我饰演渡伯的烦恼》。^①2016年6月5日,毛里求斯端午节纪念活动由毛里求斯艺术文化部联合中国文化中心以及龙狮联合会共同在蔻丹广场举办。活动除了赛龙舟外,中国成都艺术团和当地的艺术家为大家献上了精彩的节目。^②

(二) 婚姻与仪式

华人的社会活动很多,不可能由一文涵盖,但婚姻之事必须涉及。虽然毛里求斯、留尼汪和马达加斯加等地已有不少华人与当地族裔或混血儿结婚,但华人一般希望找到合适的华人伴侣。以津巴布韦为例,当地华人人数相对较少,第二代华人多去莫桑比克或南非找寻佳偶。这种现象导致相当多的华人离开了津巴布韦而移民南非或莫桑比克。后来,莫桑比克华人日益减少,津巴布韦华人的目光投向其他地区。新的趋势是第三代和第四代华裔青年向西方国家移民,特别是说英语的国家。^③华人青年中二三十岁的男女至今尚未成亲者很多。究其原因,他们有着自己的苦闷。一方面,他们大部分都希望找华人或华裔,不太愿意与当地华人结婚。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远离故国,生活在这里的华人之间几乎都存在亲戚关系。华裔男女青年虽年龄相仿,但血缘相近,不宜结婚。这样,他们宁愿独身,或期望有朝一日能回到故乡,找一个中国人作终身伴侣。^④对于新移民而言,情况也如此。根据中国学者沈晓雷的实地调研,在津巴布韦定居的新移民都希望找华人,他们中90%以上找的配偶都是新移民。^⑤

非洲华人结婚先在中文报登启事,亲朋好友表示祝贺,有的祝词表现传统文化的底蕴,如“天作之合”、“鸳鸯福禄”、“百年好合”、“珠联璧合”;有的祝福表明海外姻缘,如“花好月圆,同心永爱,海外良缘,佳偶天成”;有的体现时代特点,如“组织圆满家庭,创造伟大事业”。有的家长甚至为在

① [毛里求斯]《新商报》1957年5月30日。

② “Mauritius Dragon Boat Festival 2016”, *China Town Magazine*, July 2016, pp. 40-41.

③ Mary Olivia Tandon, “The Chinese in Zimbabwe”, Paper for the World Chinese Conference, Mauritius, April 1992, pp. 7-8.

④ 沈志德:《拳拳思乡情》,载《华声报》1983年8月23日。

⑤ 沈晓雷:《试析中国新移民融入津巴布韦的困境》,载《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5期,第139~140页。

国外结婚的孩子打广告。^①订婚典礼和结婚仪式视家境而定。订婚一般都是宴请亲友，举行舞会。在留尼汪，订婚喜宴一般安排在星期日中午，宴席费用由女方承担。订婚一年后举行结婚仪式。信教者的婚礼在教堂里举办，不信教者则租借公共场所如市政厅或剧院举办。婚事一般择良辰举办。在留尼汪，双方家长及男女傧相领新郎新娘来到市政府婚姻公证处，由市长签署结婚证书。婚礼的形式一般如下：“由证婚人，即父辈们向亲戚朋友们发出参加婚礼的邀请书：一张鲜红的纸上，绘上镀金的、象征愉快和幸福的图案。一般性仪式之后，新婚夫妇到教堂去结婚。他们乘坐的车队驶过城市和村镇。然后，客人们与新郎新新娘一起到饭店去赴婚宴。宴席上，有9个菜，‘9’既表示数字，也表示一种‘久’（原译文为“旧”），即夫妻白头到老。在大厅一角，一支乐队——或‘扩音器’——吹奏着时髦的乐曲。桌子上，放着馈赠给新婚夫妇的礼品。婚宴上，新郎新娘到每张桌前去接受对他们的祝福。晚宴结束前有场舞会。这时，来的客人就更多了。在圣但尼，在圣皮埃尔，经常看到年轻人夜里23点还耐心地等在饭店门口，看看能不能进去跳舞。这实际上回到了这么一个传统，即：希望大家都能参加婚宴。”^②婚宴费用由男方承担。男方婚后3天送烧猪礼物至新娘家。女方也择日款待新女婿，双方礼仪完毕。^③

当然，有的结婚典礼仍然沿用中华民族的传统方式，“我们曾参加过一对华侨的婚礼，仍然是古老的中国婚礼仪式；仍然是贺客盈门；开了十几桌酒席，摆设着一式的地道福建菜，热闹非凡。由此可知，华侨们的衣食住行仍然保持着中国的风俗。”^④另一位华人回忆了参加加纳的华人朋友结婚庆典时的场景：“这是一项比较严肃而庄重的结婚喜庆，是此间巨商贾先生之公子的大喜日子。婚宴设在阿克拉第一流的大陆旅社夜总会，全部餐厅都被包了下来。这个范围一时间也就变成了中国人的天下，于是最华丽的旗袍，最摩登

^① 例如，1956年，毛里求斯的《华侨时报》刊登了当地侨领陈汝添先生为在美国结婚的爱子的一则广告。“小儿绍智与丰川芳子女士谨揀6月2日在美国肯塔启城圣神天主教堂举行结婚礼，特此敬告各亲友。陈汝添偕眷同启”。参见[毛里求斯]《华侨时报》1956年6月1日。

^② [法国]多米尼克·迪朗、让·亨顿：《留尼汪华侨史》，载方积根：《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500~501页。

^③ 何静之：《留尼汪岛华侨志》，中国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66年版，第64~65页。

^④ 郑向恒：《马达加斯加的华侨》，载《侨务月报》第166期（由中国台湾地区出版），1967年6月16日。引自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1800-2005）》，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99页。

的中国饰物，都在这里展出，难怪那些外籍宾客，甚至那些侍应生们，都看得呆了。酒过三巡，新郎、新娘翩翩起舞，来宾们也纷纷参加。虽然台上的黑人乐队，奏着非洲舞曲，而大家所跳的却是中国式的缓和的舞步，旋转其间，令人感到无限的亲切和温暖。”^①

20世纪50年代，毛里求斯华人的婚宴讲排场，这种风气曾相当严重。1953年，刘兴铭医生与黎月莉女士（侨领黎子达之女）的婚礼简单朴素，借华侨联谊会场所举行，不要男女宾相，来宾200多位。他们的结婚仪式受到赞扬，“诚为华侨今后婚礼的模范”。有人借此对当时婚礼的奢靡之风提出批评，认为华人婚礼的风俗坏到极点：“尽量奢华，尽量铺张，尽量请客，以为越热闹越荣耀，徒然慕虚荣，尤其是入庙结婚的婚礼费要头等，才算得讲究华侨的婚礼，弄得中不中、西不西，惟有毛岛独有。因此，一般爱虚荣的华侨，往往因结婚而负债。请问为着一日光荣，弄到如此，何苦乃尔。所以每每结婚至少也要花五七千盾，试问青年工人，每月百盾出息者，可以有能力来结婚吗？所以每每因结婚费威迫着一般青年去讨番婆，免得一切麻烦。还有间中女方，一旦男方有诚意，即行要求金项链，要金手镯，要金戒指，结婚要怎样讲究，像这样行动，成什么风俗。所以我们对于结婚礼式，赶快要改革，凡没有婚嫁有男女同胞们要向刘医生黎月莉女士看齐。”^②

华人与其他族裔结婚的情况依不同地区而论。在毛里求斯和马达加斯加，这种情况有所增多，其原因是相应年龄的女性较少。^③留尼汪有华人血统的克里奥尔人也颇为自豪。^④新移民中与别的民族结婚者开始增多，既有中国男性

① 王申望：《迦纳华侨大聚会》，载《侨务月报》第199期（由中国台湾地区出版），1969年3月16日。

② 《刘兴铭医生黎月莉女士婚礼 简单朴素可资效法》，载[毛里求斯]《中国时报》1953年12月24日。

③ Marina Carter and James Ng Foong Kwong, *Abacus and Mah Jong: Sino - Mauritian Settlement and Economic Consolidation*,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9, pp. 197 - 202; Slawecki, *French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in Madagascar*, Connecticut: The Shoe String Press, 1971, pp. 60 - 61; 王奕华：《马达加斯加的混血华裔》，载吕伟雄：《海外华人社会新透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8页。本人2016年12月在毛里求斯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曾在下榻旅馆遇到一位从连云港移民马达加斯加的厨师，他是会议组织者专门从马岛请来的。他的妻子就是一位马达加斯加人，他们的混血儿子很活跃。

④ 汤曼莉：《海上传奇：留尼汪华人华侨志》，北京飞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98~100页。本人于2016年11月在留尼汪参加西印度洋地区历史学会研讨会时，当地侨领钟松芳、侯沐凯（Alex HOW - CHOONG）和陈庆添（Victor CHANE - NAM）等热情接待并赠送此书。本人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与当地女性的结合，也有中国女性与当地男性的婚姻。^① 在津巴布韦，与当地入通婚的现象也开始出现。沈晓雷在实地调研时遇到的4位与当地入结婚的新移民中，有的可以融洽相处，有的则因文化或习俗不同而出现一些家庭矛盾。^② 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不同种族之间的婚姻虽然是违法的，但这种情况仍然存在。以比勒陀利亚为例，在1980年的调查中，125个华人家庭中6个是有色人或华人混血家庭；在约翰内斯堡，大约有20对白人或华人结合的夫妻。这些合情合理却违法的夫妻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③ 1994年，约翰内斯堡的一位天主教神父承认，他从1968年起就开始为华人与其他不同种族结为夫妻举行仪式，开始是偷着进行，后来就公开了。他也劝说这些夫妻移民到其他国家以获取合法的结婚证书。^④ 违犯传统道德的婚姻事件偶尔发生。^⑤

华人因在当地社会遭受歧视，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努力改变自身地位。有的华人送子女去接受西方教育，除了掌握英语或法语外，还懂法律，了解各种规章制度、通过在报纸上为自己子女去国外留学做广告也成为提高社会地位的方式之一。^⑥ 另一种方式是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挣了大钱的买海滨别墅或花园洋房，挣了小钱的通过其他方式来表明自己的地位，如海滨野餐或参加舞会。^⑦ 对于华裔而言，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如公益或慈善活动既可以体现自己的价值，也可以表现自己的爱心。至于参与当地政治活动，各地华人态度不一。在留尼汪和毛里求斯，华人参政的现象比较正常。^⑧ 然而，在种族隔离

① 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嫁到几内亚的知识女性赖翠玲。她将自己的经历写了自传体小说《嫁到黑非洲》，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沈晓雷：前引文，第139~140页。

③ Linda Human, *The Chinese People of South Africa: Freeheeling on the Fringes*, Pretoria; Unisa Press, 1984, pp. 68-69.

④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op. cit., p. 368.

⑤ 例如，根据1956年5月21日的报道，一位18岁的华侨女子与一位回人（伊斯兰教徒）私奔。逃走之日将家长价值2000盾左右的首饰拿走。这位回族青年已婚，并有4个孩子，曾在华侨办货公司任职，后自己开印务局。俩人处于恋爱阶段，一起看电影。当该男子的回人朋友责备他玩弄女性时，他说，“这不是我们回族的女子，而是中国人的女子。”载[毛里求斯]《华侨时报》，1956年5月21日。

⑥ 《黎子达先生令郎黎永源留学英伦志喜》，载[毛里求斯]《华侨时报》1956年6月6日。

⑦ 刘新舜：前引书，第60页。

⑧ 有关毛里求斯的情况，参见侯碧红：《毛里求斯从政华人探析》，载吕伟雄：《海外华人社会新透视》，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244页。有关留尼汪的情况，See Edith Wong-Hee-Kam, *La Draspore Chinoise aux Mascareignes: Le Cas de la Reunion*, L' Harmattan, 1996, pp. 339-345.

制下的南非，情况则完全不同。

（三）低调且不参与政治的行事方式

对于长期在种族歧视环境中生活的南非华人而言，低调且不参与政治成为一种聪明的融入方式。他们争取权利、提高地位及融入社会的重要方式是低调、社会参与和不参与政治。例如，早在1948年，华人首次参加南非标准舞会伊丽莎白港支会举办的六月比赛大会。当时，华人选手参加了中西混合组和华尔兹舞两个组的比赛。刘金宝君、刘月英女士和刘沛佛君夫妇（探戈舞）参加中西混合组，斯特拉·侯（Stella）和多萝西·刘（Dorothy）女士参加华尔兹舞比赛。华人观看者达50余人。《侨声报》特别发报道，并鼓励：“此次我国侨（民）虽不及格，但能与西人一比高下，实属难能可贵，尚望善乎之同侨勉之勉之。”^① 1980年有关华人社会的调查报告对华人青年大学生就有这种看法，他们远离政治，从不准备“兴风作浪”。^② 叶慧芬和梁瑞来在她们的著作中指出：“大家一般都认为华人不管有什么成就，主要归功于他们‘行事低调’，这一直是他们最好的行动路线。地方华人社团在其所在地处理他们面对的问题时，经常能成功赢得官方的同情。”^③ 这种低调策略确实比较成功，华人实际地位逐渐改善。这种结局似乎引起了其他非白人种族集团的嫉妒。一位华人这样解释：“所以，到了种族隔离后期，我们能进白人的医院、白人的电影院，我们能进入其他非白人不能去的设施。从法律角度看，如果他们搬出法律条款来，我们确实没那么多权利，但是你知道的，对中国人，他们睁只眼闭只眼……所以我想许多黑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种——你记得所有非白人——嫉妒我们享有更多特权……但是你理解华人的处境，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处境。谁会说‘我们不要利用这一处境’？你肯定想去白人医院，因为那里设施好得多。”^④

朴尹正在华人中进行采访时，62岁的阿伦回忆了华人当时的一些实用主义的做法，例如举办舞宴时，将捐款赠给白人社团。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① 《坡埠华侨参加舞会》，载[南非]《侨声报》1948年6月17日。

② L. N. Smedley,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Some Aspects of the Life of South Africa's Chinese Community", Pretoria: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Unpublished D. Litt et Phil Thesis), Quoted from Linda Human, *The Chinese People of South Africa*, p. 64.

③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op. cit., p. 381.

④ 朴尹正：《荣誉至上——南非华人身份认同研究》，吕云芳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

在南非这个种族主义盛行的社会里，努力改善华人族群的整体利益。阿伦回忆：“由于种族隔离法律，我们尽量把孩子送到白人学校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举办华人舞宴是其中之一。这次舞宴面向白人社区，所有收入都捐给白人社团……不久后我们的孩子开始进入天主教学校……慢慢地我们开始能进白人学校了。但这只是一个特惠，不是权利……那时候，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① 这种稳步求进、低调力争的策略一直通过各种渠道逐渐实施。保守低调且不参与政治的策略形成了南非华人社区的一种共识、一种传统，几乎形成了华人社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因此，一旦出现与这种共识不相吻合的做法时，华人社团就群起反对。1980年，当“台湾当局”推动南非政府委任一名华人为总统咨询委员会委员时，霍成坚表示接受任命。此事引起大部分华人反对，最后导致了华人社区独立性的增强。^②

华人的社会生活中还有许多具有共性且值得提倡的集体活动和共生原则，例如慈善捐赠，中医养生，敬老尊贤，勤勉节俭，教化秩序等。从事慈善活动一直是华人社区的活动，明显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普济众生观念的传承。例如，1966年2月，莫桑比克洛伦索-马贵斯遭特大风水之灾。贝拉港中华会馆主席甄景炎等多位侨领专程向侨胞捐款救济灾民。所有捐款由甄景炎主席面呈时任贝拉港总督，委托他转交给罗埠相关机构以用于赈灾。^③ 1969年，南非华商李铿发将令堂大人七秩晋一华诞贺礼441.5兰特（约合618美元）全部献作公益事业外，更捐出358.95兰特（约合503美元），共约800兰特（约合1121美元），分别捐给约翰内斯堡国定中学、伊丽莎白港华校、开普侨校、《侨声报》等机构。^④ 敬老的传统一直在华人社区传承。毛里求斯华联会成立于1975年，由一群华侨、华裔中青年学者和专家及工程技术人员发起，主要宗旨为促进华侨华裔间的互助团结，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并经常组织一些文体活动，如健身体操、游泳、划船等，并积极开展华社公益活动，深受大家欢迎。例如，1986年6月22日，华联会组织70多位老人到北部巫沙济海滨半日游。老人们感慨地

① 朴尹正：前引书，第37页。

② 有关此事的前因后果，参见朴尹正：前引书，第58~59页；“Winchiu Puts His Case”，*Pretoria News*, October 6, 1980；“Businessman replies to Chinese critics”，*Evening Post*, 8 October, 1980, Quoted from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p. 411.

③ 《卑拉中华会馆救济罗埠灾民》，载[南非]《侨声报》1966年2月15日。

④ 《殷商李铿发先生庆堂堂慨捐巨款》，载[南非]《侨声报》1969年7月8日。

说：“我们在耄耋之年仍能得到华联会当局的关怀，招待半日游，甚感幸福。希望所有侨团都能关怀我们老华侨、华裔，多组织老华侨、华裔进行类似的有关身心的活动。”^① 这种为弱者捐赠，为社团做慈善的行为几乎存在于每个华人社区。

当然，华人中也存在着诸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偶尔也会出现吸毒现象。^② 然而，华人中最令人不安的是团结问题。1957年，毛里求斯《新商报》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数年来，我们民主^③集团中一直是大雨过后细雨来，未曾有晴朗的一天”，因封建残余思想作怪，先是两方互不相让，从而使坏分子乘机钻营，造成分裂局面。“我们希望的是大家携手向共同目标前进……群众知道糊涂旧账有多少，为了祖国，让我们一笔勾销。”文章认为华侨应在爱国一家的口号下团结起来。^④ 不团结是华人中的普遍现象。1992年，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施乃良离任前在华人欢送他的宴会上表示：“毛国政界人士和各族人士曾对我表扬过华人的许多优点。例如：勤俭持家，尊贤敬老，重视教育下一代和对毛国经济繁荣做出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从来没有人说过对华人团结的赞语。”毛里求斯归侨刘新舜认为，两岸关系缓和后，华人中左右两派的斗争缓和，但左派内部不同派系的矛盾却激化并上升为主要矛盾，“有些人甚至准备诉诸法律，对簿公堂”。^⑤ 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其他国家。一位在几内亚的台商抱怨：“这里有许多大陆和台湾商人，但不知为何中国人总是不团结，总是窝里斗，他们既喜欢抱头又喜欢踢脚。”^⑥ 这种现象是华人社会的通病，也引起国际学者的注意。在研究佛得角华人店铺的论文中，作者称华人社会是“一人为龙，三人成虫。”^⑦

（四）华人与赌博

1. 毛里求斯唐人街——“赌博之城”

在非洲的华人移民中，赌博是华人社区中一种永久之“痛”。有的人走进

① 《发扬中华敬老传统，开展华社公益活动》，载《华声报》1986年7月29日。

② 1956年6月，3名涉毒华人被判刑，载[毛里求斯]《华侨时报》1956年6月6日。

③ 原文表述即如此。

④ 《社论：为了争取团结，反对制造内争的任何挑衅》，载[毛里求斯]《新商报》1957年2月23日。

⑤ 刘新舜：前引书，第75页。

⑥ 赖翠玲：前引书，第365页。

⑦ H. Haugen & J. Carling, “On the Edge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The Surge of baihou Business in an African cit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8, No. 4, 2005, pp. 636-662.

赌场或是为了排遣孤独，或是为了娱乐消遣，或是为了缓解压力，或是为了寻求刺激，或是为了简单的发泄。这样，他们的举止通常失去了往日的理智和精明，徒然显得冲动和放任。几乎每本关于非洲华人的调研、采访、自述和研究著述中，往往会提到华人赌博这一现象。^①在博彩业合法的国家，中国男性总是赌场的常客。“在这里，将自己打拼多年积累的资金一夜输光的事情绝不罕见，每天都有人一夜破产。而且，相比人口基数相当或更大的欧美人和印度人，中国人中的赌徒比例高得出奇。”^②《唐人街：毛岛往事》中的一章标题是《赌博和娱乐之城》。“过去，在唐人街的每个角落都能听见搓麻将的声音。生意人是麻将馆里的常客。一些人甚至夜以继日沉迷其中，把妻子留在家中看店。嗜赌如命之徒常常输个精光，也毁掉了自己的生活。”^③

赌博在毛里求斯有很长的历史。在外国学者 1873 年出版的著作中，曾提到一家店铺老板在节日里去赌博，将家业输给伙计，自己不得不从事店里的杂活。^④毛里求斯还有赌马庄家，原来位于中央广场附近，1985 年才被迫搬到战神广场的赛马场里。友谊娱乐场是黎友添家族掌管的赌场，在毛里求斯赌博业中颇有名气。这里的赌徒经常通宵酣战，不时有各种纠纷和打斗发生。1999 年 5 月 23 日晚，黎老板自己在国外，赌场里只留下他怀孕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妻舅及赌场员工。当晚 7 时，赌场发生的一场大火吞没了整个赌场，包括老板妻子、女儿及妻舅在内的 7 人遇难。时任总理乌蒂姆将这场火灾定性为“屠杀”。友谊娱乐场从此不复存在，在唐人街留下了一块永恒的伤疤。^⑤

2. 南非赌博业之殇

赌博在南非华人中存在着很长的时间。人们一般将赌博看作一种社会活

^① 例如，徐歌：《独闯非洲——我在南非的冒险之旅》，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年版，第 83～91 页；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总会：《追梦——上海人在非洲》，第 117、187～197 页；《大量在非华人仅靠赌博娱乐 赌场中只有中国人》，载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02/5582903.html>，2017-05-14。

^② 常江、袁卿：《再见巴别塔——当中国遇上非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68 页。

^③ [法国] 帕斯卡尔·萧：前引书，第 116 页。

^④ N. Pike, *Sub-tropical Rambles in the Land of the Aphanapteryx*, London: Sampson Low, 1873, pp. 173-174.

^⑤ 帕斯卡尔·萧：前引书，第 184 页；刘新舜：前引书，第 75 页。有些外族人对华人的评语是“会读书，会做生意，爱赌博”。

动，是无聊与孤独的解药，而不是犯罪。^① 特别是新移民，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孤独与无聊是一种普遍现象。^② 这样，他们喜欢去华人扎堆的地方。赌博早年有“fan tan”（实际上只是赌博的一种方式）之称，后来又有“fah - fee”等形式，现在通称为“开字花”。早在1890年4月11日，4名华人在南非金伯利因为赌博导致的杀人罪而被控告。1897年12月，19名华人在约翰内斯堡因赌博被捕。这种恶习一直沿袭至今。^③ 后来，一些契约华工因孤独难耐养成抽鸦片、赌博的坏习惯。^④ 值得说明的是，早期的南非华人会馆一直致力于开办中文学校，由于经费困难，华人各有自己的店铺要维持，因此也不可能总是通过捐资筹款。为了筹集办学经费，一些中华会馆曾一度从开办赌博的华人赌场中收取利润分成。

时至今日，一些南非华人对赌博似乎仍是情有独钟。各个城市大型游乐场内如太阳城、嘉年华等都设有赌场。约翰内斯堡的各个赌场规模庞大，装潢豪华。国际机场附近的凯撒赌场，其停车场可泊车1500辆。赌场内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如星级宾馆、餐厅、咖啡厅、游乐场等，是集消费、娱乐、休闲、社交、商贸于一身的场所。数百台老虎机一路排开，等待着各路财神。有人将赌场称为“销金窟”，认为南非的中国人90%都去过赌场。“如果不赌，几乎近一半可以成为千万富翁。”南非华人爱赌有各种原因：混吃混喝（赌场免费供应点心、饮料和香烟）、孤独难耐、寻找机会和碰碰运气。现任南非-中国合作论坛主席的盛立华先生是赌场的常客。他和他的亲属驻扎在赌场并享有免费吃喝住宿的优惠。这种优惠只给那些特殊赌客——赌资积分超过50万元的赌客。^⑤

有的人因赌博倾家荡产，有的人因之失去亲人，还有的人因输钱夫妻反目。南非某省同乡会副会长通过做货柜生意赚下数千万家产。由于生意亨通，财源滚滚，他将注意力转移到赌博，成为赌场的职业赌客。由于他成天泡在

①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op. cit., p. 205.

② 陈凤兰：《文化冲突与跨国迁移群体的适应策略——以南非中国新移民群体为例》，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46~47页；常江、袁卿：前引书，第97~102页；Giles Mohan, Ben Lampert, May Tan - Mullins and Daphne Chang, *Chinese Migrants and Africa's Development: New Imperialists or Agents of Change*, London: Zed Books, 2014, pp. 87 - 89.

③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 pp. 48, 84, 240, .

④ 沈已尧：《海外排华百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146页；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 pp. 119 - 223.

⑤ 钱丽君：《他们曾经在赌场生活》，载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总会：前引书，第187~197页。

赌场又不听妻子苦言相劝，妻子离开他回国。他没有了妻子的监督和规劝，带着六岁的孩子终日赌博。然而，正是嗜赌成性使他永远失去了心爱的孩子。一天，他连续狂赌了20余个小时，次日上午6时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儿子开车回家。在暴雨中，他想将车驶进停车带，等雨停了再赶路。然而，由于极度疲劳，他在变线时没注意后面的来车，被一辆大卡车拦腰撞上。这样，他车上放着的价值几十万兰特的筹码和现金撒落一地，自己被人送进医院，而心爱的儿子被埋葬在遥远的南非土地上。^①

“字花”业由早期来南非的老华侨开创，已有100余年历史，长期以来由华人垄断。^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华人涌入南非，有的加入了“字花”业。他们中有的人从打工到自己“占地盘”当老板，使得这一行业迅速膨胀，其活动范围也从豪登省扩展到南非各地。“字花”业在南非属于违法行为，处于半公开状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第一，参与的华人得不到法律保护。华人不断将“场”拓展至各个地区，安全得不到保障。第二，有的华人一天要开50多个场。为了赶场，他们汽车开得飞快，导致交通事故频发。第三，华人行业间为了争地盘，各种冲突竞争导致恶性事件发展。第四，半公开的性质为政府人员提供了犯罪的机会。有的刑事警察、交通警察和税务官员借此进行敲诈勒索。第五，由于这一行业吸引了不少赌客，一些赌客甚至将儿童救济金或失业救济金也拿来赌博，对华人造成极坏的影响。当地民众对这一行业非常反感，称组织赌博的华人为“骗子”、“小偷”。^③华人在南非很辛苦，但赚钱相对容易。然而，正是南非的赌场将中国人辛苦赚的钱又化为乌有。

确实，非洲华侨华人中有一小撮人无视法律，从事偷猎、走私、诈骗、卖淫等非法行为，给新移民整体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然而，在这其中，艰难创业的是多数，勤俭持家的是多数，安分守己的是多数。正如南非侨领姒海所言：“我们明白：个人所追逐的目标其实和中华民族伟大崛起有着必然的联系，即使是‘经商天才’或‘耐劳巨人’，我们最终不过是时代港湾中的一朵小浪花。我们的成功所仰赖的价值标准始终需要：勤劳、勇敢、诚实、

^① 徐歌：《独闯非洲——我在南非的冒险之旅》，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88~89页。

^② 关于“字花”赌博规则，请参见刘新舜：前引书，第67~68页。

^③ 李可：《南非华人地下赌博业现状 华人最古老行当之一“开字花”》，载[南非]《南非华人报》2007年11月21日。有关毛里求斯的中式彩票，可参见刘新舜：前引书，第67~68页。

创新和爱国。”^①

结 论

在非洲华人求生存、图发展、谋融合的漫长之路上，华人的社会生活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一方面，他们必须适应当地的情况，对自身的社会风俗和生活习惯进行某种调整。唐人街的变迁证实了这一过程，有的从聚集、贸易的中心到集贸易、文化和交流为一体的文化交流中心（如毛里求斯），有的不仅为贸易旅游提供便利并成为新的民族融合之途，而且得到当地政府的官方认可（如南非）。中餐馆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另一个例证，从单纯提供就餐方便到探索传播中国文化的新方式，从而展现了中餐在非洲的饮食文化之变。当然，华人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始终演绎着文化的嬗变之途。

华人移民的社会生活中保留中华文化的程度与多种因素相关。一般而言，移民社会中的民族融合是一个不断适应与变化的过程。有的国家采取强迫同化的政策，使移民不得不放弃自身的文化特点（包括语言和姓名），则又当别论。移民祖籍国的文化会以各种形式保留下来，同时移民社会又不断吸收所属国文化的因素。当然，移民文化的这种保留、适应、吸收与演变受到多种物质和人文因素（华人人口、当地政策、移民状况、中国国力等）的影响，同时还存在着“时间差”和“距离比”。“时间差”指迁出的时间与主体认同（即华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的可能性成反比，即移民的时间越久远，中华文化在当地保留程度愈低，主体认同的欲望和可能性较小。“距离比”指华人的所属国与中国相距较近，主体认同的可能性相对较大，相距较远，中华文化的保留成分越少，从而华人主体认同的可能性越小。^②当然，这种对海外华人的辨识必须建立在承认他们目前对所属国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另一个问题。

① 如海：《追逐梦想总是百转千回 让我们依然坚持追逐——写在〈追梦——上海人在非洲〉刊印之前》，载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总会：前引书，序。

② 本人曾讨论过以下4个概念：主体认同、客体认同、“时间差”和“距离比”。参见李安山等：《双重国籍问题与海外侨胞权益保护》，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in Africa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i Anshan

Abstract: In the long process of integration, the Chinese in Africa have gains and losses in their survival, development and adaptation in the local society. Studying th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in Africa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article tries to illust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social life through the Chinatown in Mauritius, South Africa, etc., Chinese restaurants, Chinese traditional festivals, marriage ceremony and their social behavior pattern. Having adapted to the local social customs, Chinese immigrants, at the same time, try to keep the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bsorb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y settled. The reservation, adaptation, absorption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re influenced by material and mental factors, plus “time difference” and “distance ratio”, another two important factors.

Key Words: Chinese Immigrants in Africa; Social Customs; China Town; Chinese Restaurant; Traditional Festival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